

秘篆新启：美洲殖民地时期的三大文学奇观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西、葡殖民者和后来的英、法殖民者对美洲古代文明的洗劫和毁灭众所周知。殖民者留下的大量信史和一代代印欧混血儿的记述便是明证。同时,个别传教士和众多原住民的控诉也见证了这一切。至于文学,人们大抵只关注殖民地一贯评鹭,对期间的旁逸斜出则视为“异端邪说”,或讳莫如深,或弃若敝屣,或打压禁毁。这里仅就美洲殖民地时期文学的三大奇观略呈管见:作为古代遗产的《波波尔·乌》、作为“道统”的“第十缪斯”和作为“异端”的“禁毁小说”。

【关键词】美洲殖民地时期;《波波尔·乌》;第十缪斯;禁毁小说

【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21)03-0001-11

随着西、葡殖民体系的确立,美洲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一方面,大量西班牙、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移民纷至沓来,为美洲带来了灭顶之灾或“勃勃生机”,就看从什么角度;另一方面,根深蒂固的种族矛盾和文化偏见不断触发新的危机,并为后来的独立战争埋下了种子。

回溯历史,有许多故事值得记取。首先,玛雅神话传说《波波尔·乌》居然被侥幸发现并存活了下来。同时,就西、葡殖民地文学而言,除却巴洛克风格找到了持续存在的土壤,以土生白人为主体的表现殖民地生活的新大陆文学迅速滋生。这里或可将三百年西、葡殖民地文学归为两类:一类是西、葡宗主国文学在美洲殖民地的延伸,另一类是殖民地本土文学的萌发。前者以“第十缪斯”为最高表征,后者则大抵被忽略抑或埋入尘埃。当然,二者时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截然区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二者以不同的方式对殖民道统进行了背叛。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这个体裁的命运。迄今为止,国内外文学史家均将19世纪初独立战争时期的《癞皮鹦鹉》(1816)视作“拉丁美洲的第一部小说”,实则大谬不然。用我们古人的话说,乃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鲁迅关于我国小说命运的界定也恰好印证了这一点,“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①。这自然是循着夫子^②或古来道统之谓而谓,却让我们想到了西、葡殖民者在经营美洲殖民地时所遵循的法则:既不准西方小说流入美洲,也不许殖民地作家创作小说这类有违天主教道统的“异端邪说”。

一、《波波尔·乌》或古代玛雅遗产

不消说,美洲曾经是印第安人的家园,它自亿万年前地壳变动而成为一洲以来,一直在那里,就在那里,既不旧也不新。据考古发现,仅今墨西哥一带,就曾产生过多种古老的文明或文化。其中重要的有玛雅、奥尔梅卡、托尔台卡、奇奇梅卡、特奥蒂华坎、萨波台卡、托托纳卡、密斯台卡、阿兹台卡等等。这些文化或民族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相互影响自不待言,相互倾轧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以美洲部落为参照,对希腊、罗马等欧洲早期城邦与帝国的由来及社会形态进行了梳理,认为

【收稿日期】2021-02-06

【作者简介】陈众议(1957-),浙江绍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班牙语文学和文艺学。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② 《论语·子张》谓:“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大多数的美洲印第安人,都没有超过联合为部落的阶段”^①。至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如地震、洪涝、干旱、瘟疫、战争等^②导致的迁徙又加剧了有关部落、民族间的冲突或融合。除阿兹台卡外,今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其余文化或王国在西班牙人入侵时均已盛极而衰,而殖民统治视美洲文化为异端,致使其遭受灭顶之灾已然是众所周知的事。

玛雅、印卡、阿兹台卡等印第安人在那里创造了辉煌文化和丰富的文学。但是,迄今留存的较为完整的古代神话传说却仅有玛雅基切部族^③的《波波尔·乌》(Popol Vuh)。自从18世纪30年代美国人约翰·斯蒂芬斯在洪都拉斯的热带丛林中首次发现了玛雅古文明遗迹,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在中美洲和墨西哥荒原、丛林又发现了许多处被弃的玛雅古代城池。囿于玛雅人早就遗弃了他们的城池,他们用软木制造的纸张和中国折扇似的折叠书筒本来就不易保存,在相对干旱的尤卡坦半岛被废弃并逐渐荒芜后,这些书筒很难在潮湿的今墨西哥南部恰帕斯,以及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一带保存下来,西班牙人入侵后更使其遭受了灭顶之灾。16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和天主教会焚烧了大量玛雅文献。20世纪考古学家发现的玛雅象形文字大都镌刻在金字塔、神庙等建筑的墙体和石碑上,而且至今没有能够全部破译。目前我们所能读到的玛雅文学作品,大都是16、17世纪由西班牙人转译的。其中,最早的译本为玛雅基切神话《波波尔·乌》。

《波波尔·乌》^④是聚居于今危地马拉玛雅基切的族人之书,堪称玛雅人的《圣经》。自从位于尤卡坦半岛的玛雅帝国坍塌后,其文明的中心便不复存在。作为玛雅人的分支,基切人继承了部分玛雅文化遗产,其中就包括神话传说。比基切人更早到达危地马拉的,还有玛雅分支卡克奇盖尔人(Cakchiquel)。西班牙人入侵中美洲时,基切人和卡克奇盖尔人正爆发激烈的战争。西班牙人乘虚而入,但还是遭到了两个部族的强烈抵抗,尽管最后以印第安人的失败告终。

最早发现《波波尔·乌》的西班牙人是一位叫作弗朗西斯科·希梅内斯的多明我会修士。此人出生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1688年奉命到中美洲传教。到达今危地马拉后,教团给他指派的任务是撰写殖民地方志。希梅内斯在撰写“危地马拉省”^⑤方志时,凭借过人的语言天赋,无心插柳地学会了基切语。未几,他在一个叫作奇奇卡斯台南戈(Chichicastenango)的地方发现了基切人珍藏的《波波尔·乌》的西班牙语拼音本。这个拼音本是由基切人于1558年根据西班牙语发音书写的玛雅基切手稿,就像同一时期滞留在西班牙的穆斯林用阿拉伯语拼音书写的西班牙语文本——阿尔哈米亚语手稿(Aljamiado)。希梅内斯潜心研读了手稿,并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于1701年将其翻译成了西班牙语。

从1701年到19世纪50年代初,希梅内斯修士的这份西班牙语翻译手稿一直默默无闻,直至1854年被美国牧师阿尔伯特·布拉瑟尔发现后才得以重见天日。后者将手稿从危地马拉圣卡洛斯大学图书馆“借出”后偷偷带到欧洲,并译成法文。法译本出版后,他随即又将希梅内斯手稿卖给了古籍收藏家,最后这份手稿辗转回到美洲,现藏于芝加哥纽贝里图书馆。

囿于手稿本身是由两种语言合成的,加之法译本率先出版,引发后来版本之多、之乱,可谓无以复加。据危地马拉学者阿贝尔蒂娜·萨拉维亚不完全统计,迄今至少有五十余种不同或不尽相同的《波波尔·乌》行世。

鉴于《波波尔·乌》版本众多,本文沿用波鲁阿出版社1981年版。该版本由萨拉维亚根据希梅内斯抄本,并参照玛雅纪事修订^⑥:

太初混沌,一切静止,没有人类,没有动物,没有鸟,没有鱼,没有蟹,没有树,没有山石,没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164页。

② 1. 墨西哥处地震带,有些早期建筑物的倾斜和损毁明显非人力所为;2. 洪涝和干旱,尤其是后者在尤卡坦半岛留下了明确的印记:沙漠化景象。即使尤卡坦半岛有天坑(“天眼地洞”及其连绵的巨大溶洞如今水源丰沛,而且直通金字塔底部),却难以遏制整个半岛的沙化。而科潘(Copán)古迹那样规模不小的人工水渠却是在今洪都拉斯境内;3. 玛雅人的《契伦·巴伦之书》记录了黄热病之类的传染性疾;4. 战争更是部族之间经常发生的,譬如16世纪初基切人与卡克奇盖尔人的大规模流血冲突;5. 内部因政治经济等原因发生的动荡;6. 农业的衰微,玛雅的农具和耕作方式已无法满足人口的增长,等等。美国考古学家普遍倾向于第六个原因,理由是迄今发现的玛雅农具远不及后来的阿兹台卡人的生产工具,因此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耕作。Morley, Sylvanus G., “La civilización maya”, México:Talleres de Litorarte, 1961, pp.84-89.

③ 生活于今危地马拉境内。

④ 又称《族人之书》(Libro Nacional de los Quichés),过去也曾译作《公社之书》。

⑤ 隶属于新西班牙副王总督区。

⑥ 国内已有两个译本可资参阅:一个是1996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梅哲译本,另一个是201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艾飞译本。

沟壑,没有藤蔓。大地尚未显形,大海沉默安宁,天空苍莽寂寥,一切无声无息。^①

这是《波波尔·乌》开篇第一节。《波波尔·乌》是目前唯一“完整”的玛雅神话传说,虽然它只是基切部族的神话传说,却大体上反映了古代玛雅人的创世观、生死观和善恶观^②。其中关于洪水的描写颇似希伯来神话;而用泥土造人的传说又难免让人想起我们自己的《山海经·大荒西经》关于女娲造人的故事。至于两个青年英雄大战恶人和地狱冥界的故事,则让我们联想到古希腊和古印度传奇,甚至苏美尔人的英雄史诗。譬如年轻的忒修斯带着抽中签的童男童女来到克里特牛头怪弥诺陶洛斯的迷宫,并在克里特公主阿里阿德涅的帮助下,用她的宝剑斩杀了弥诺陶洛斯,还用她的线团破解了迷宫。又譬如流放中的王子罗摩途径楞伽岛,妻子悉多被十首魔王罗波那劫走。罗摩与猴国结盟,猴王麾下有一神猴哈奴曼机智神勇(据说是孙悟空的原型之一)。在神猴的帮助下,罗摩终于战胜魔王,救回悉多。但罗摩怀疑悉多的贞操,悉多投火自明。火神从熊熊烈火中托出悉多,证明她纯洁无瑕。夫妻团圆,流放亦期满。罗摩回国登基为王,阿逾陀城出现空前的太平盛世。但罗摩听到民间又传出悉多不贞的流言,他于是忍痛把有孕在身的悉多遗弃在恒河边上,悉多得到蚁垤仙人的救护,并在净修林中生下一对孪生子。多年以后,罗摩举行马祭,蚁垤安排孪生子与罗摩相会,并向罗摩讲述自己的故事,从而智慧地辨明了悉多的贞节。但罗摩仍认为无法取信于民,悉多无奈,终于向大地母亲呼救,说如果自己贞洁无瑕,请予收容。顿时,大地裂开,悉多纵身投入大地怀抱;罗摩升入天国,复化为毗湿奴神。

在苏美尔人的英雄史诗中,不仅有洪水的传说,也有英雄惩恶的故事。话说女神阿鲁鲁制造了恩奇都,试图让他去消灭专横暴戾的吉尔伽美什。恩奇都来到乌鲁克后听说吉尔伽美什夺取少女贞洁,便无视神妓的忠告,挑战吉尔伽美什。两人大战数百回合不分胜负,结果惺惺相惜,结为好友,陪伴吉尔伽美什攻打怪兽洪巴巴。随后,他们又共同杀死了牛魔,结果恩奇都在梦中遭到天谴,病重而亡。吉尔伽美什悲痛欲绝,为恩奇都举行隆重国葬仪式。慑于死亡的可怖,吉尔伽美什决定寻找永生的方法,并开始了艰难跋涉,他历尽艰辛找到了大洪水的唯一幸存者,向他探寻生死奥秘。幸存者接待了他,并从前者的妻子那里获得了到海底寻找永生草的线索。他好不容易获得了仙草,却被海蛇抢食了。吉尔伽美什最终领悟了人终究一死,无论他多么伟大。吉尔伽美什回到乌鲁克城后十分怀念亡友,祈求神的帮助,以便探望恩奇都,在神的帮助下,他通过生死隧道见到了恩奇都,恩奇都描述了地狱的恐怖。

在玛雅和几乎所有美洲神话中,死亡和地狱并不可怕。它们无非是人类得以再生(恰似佛教轮回观)的驿站。在玛雅人那里,乃至如今的墨西哥、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生命被认为是短暂的,但灵魂和生命力却是无限的。“人生是一段路程,是通往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命的过程。”^③这在阿兹台卡人的生死观中得到了传承,并且一直鲜活地留存于墨西哥、危地马拉后人的观念之中。于是,便有了阿斯图里亚斯和鲁尔福的魔幻、帕斯的玄奥。而这些魔幻与玄奥却是墨西哥人和危地马拉人的家常便饭。譬如墨西哥人的亡灵节,那完全不是我们清明节的模样,而是欢乐喜庆、充满调侃的一个节日。家家户户吃骷髅形南瓜糖,挂各种各样喜庆的、具有反讽意味的“鬼灯”。大街小巷上演奏的是充满节庆色彩的马利亚切。^④这也是迪士尼影片《寻梦环游记》(Coco, 2016)所昭示的。

《波波尔·乌》正是有关信仰的源头,故而被称为玛雅人的《圣经》。如今的玛雅人散落在祖先的土地上,被剥夺了一切,没有丢失、难以忘却的便是这些神话传说和来自远古的心声。我们的问题是眼前的《波波尔·乌》有多少是原汁原味的玛雅基切神话?这个问题不易回答,盖因《波波尔·乌》犹如伽朗版《一千零一夜》,它从16世纪这个时间节点出发,一脚向古,另一脚向今。我们坚信玉米人的神话传说只能产生于古代美洲,但同时我们不能不对某些表达心生疑窦,诸如“三位一体”之类的概念或诸如此类似是而非的雷同,譬如话语的重要性——“话语来临”或使人迁思希伯来《圣经》。毕竟,这个《波波尔·乌》是经西班牙传教士之手留存下来的,不可能不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浸染。如今,在种类繁多的版本中,我们似乎窥见了这样一种事实:现在

① “Popol Vuh, Albertina Saravia ed.”, México: Editorial Porrúa, 1981, p.3.

② Westheim, Paul, “Arte antiguo de México”, México: Ed. Era, 1970, pp.13-35.

③ Ibid., p.63.

④ “Mariachi”, 墨西哥民间音乐。

的玛雅人(因为通晓西班牙语)而不得不浸淫在西方文化的染缸里,绝大多数还成了“天生”的天主教徒。那么,他们信奉的《波波尔·乌》有多少是原始《波波尔·乌》的基因?我们不得而知。

一如伽朗本《一千零一夜》反过来影响了后来的阿拉伯本土版《一千零一夜》(如加尔各答本或布拉克本和埃及本)。没有伽朗,也许永远不会有阿里巴巴和辛巴达的故事。那么,如果没有希梅内斯修士,《波波尔·乌》又当如何?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即或允许假设,那么就像克罗齐所说的那样,一切历史也总是当代史。

二、“第十缪斯”或殖民地的仙葩

今拉丁美洲作为16世纪初至19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上起现美国西南部,下迄今阿根廷,绵延数万里。在这不算短暂的三个世纪当中,相当辽阔的西、葡殖民地“并未产生小说”,倒是极具偶然性地出现了惊艳世道的诗坛仙葩——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修女(1651—1695),史称“第十缪斯”。她不仅才艺超群,而且貌美倾城。她的作品继承了西、葡“黄金世纪”的遗风,并巧妙地借“信仰的谋略”超越了同时期欧洲文学,故而有意无意地成了“晚到的文学盛宴”。虽然国内外学界同行就胡安娜的作品与女权主义倾向有过评述,但迄今尚未对其背后的缘由进行恰当的探赜和分析。

在殖民地文坛的高峰——胡安娜出现之前,西、葡文艺复兴运动高涨、巴洛克文学已臻圆熟,后者显然也是美洲巴洛克文学的主要来源。同时,在胡安娜之前,美洲已然不是一片文学的沙漠;16世纪和17世纪初涌现的殖民地诗人,无论良莠,也多少为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标尺。第一个来源毋庸置疑,本无须赘述,但考虑到胡安娜的特殊性,又不得不有所交代,至于第二个由来,则必须稍加注疏。

首先,女诗人自古有之,但她们往往身份特殊。譬如古希腊公元前6世纪的萨福(Sappho),也曾有“第十缪斯”之称,但在中世纪却一度化为乌有。据传,她一生写过不少诗篇,其中主要有情诗、婚歌和铭文。一般认为她出生于莱斯波斯岛(Lesbos)的一个贵族家庭,乃父酷爱文学,受他的熏陶和鼓励,萨福从小迷恋诗歌。她也是第一位描述个人隐私如恋爱、失恋,甚至同性恋倾向的女诗人,以至于她的故乡(英语作“Lesbian”)和她的名字(英语作“Sapphic”)成了女同性恋的代名词。

虽然迄今为止西、葡“黄金世纪”文学中尚未发现明显的同性恋描写,但美洲殖民地的两位匿名女诗人却为胡安娜提供了旁注。她们的出现当是殖民地文学的重要事件,尽管向来不被提起,17世纪初南美文坛双女星座克拉林姐(Clarinda)和阿玛丽利斯(Amarilis),胡安娜当然知道她们的存在^①。

克拉林姐和阿玛丽利斯都曾生活在今秘鲁利马,而这两个名字显然不是她们的真名。她们之所以拥有如此才情,则可能是因为出身名门,并且受到了良好的文学熏陶。这种熏陶可能来自家庭,也可能来自特殊的文学沙龙。至于她们何以隐姓埋名,却多半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譬如社会偏见。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唯有两部诗集,克拉林姐和阿玛丽利斯各一部。这两部诗集其所以流传至今,是因为她们都曾得到秘鲁乃至西班牙名流的青睐,并且受邀写下了不少应景之作。而这反过来说明她们的名声曾经是何等响亮。譬如在梅希亚·费尔南希尔出版于1608年的《南极的帕尔纳索斯》中收录了克拉林姐的一首八百多行的长诗作为集序:《兹为诗颂》。在此,克拉林姐明确地亮出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并以此为荣。

幸运的是身为女人,
巧手可指和煦天空,
彰显女人至善至美。
我是众多女人之一,
因为之一心有不甘,
自诩来自得洛斯岛!^②

她甚至历数从萨福到特蕾莎等一千才女,以证明女人并不输给男人。为了证明女人的美德,她甚至直接搬出圣母玛利亚,谓后者的伟大和智慧无人可及。

^① Sabat de Rivers, Georgina, “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 y otros poetas barrocos de la Colonia”, Madrid: Biblioteca Virtual Universal, 2010, p.96.

^② 希腊神话指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的诞生地。

与此同时，阿玛丽利斯创作了《致贝拉尔多》，它除了在殖民地引起巨大反响，还传至西班牙，被西班牙文坛泰斗洛佩收入《菲洛美娜》(1621)。与克拉林姐不同，阿玛丽利斯似乎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虽然隐姓埋名，却似乎依然笃信宗教，并且充满了出世情怀。一如西班牙“黄金世纪”诗圣贡戈拉晚年，她认为人生无非是短暂的过程，唯信仰恒久不变。然而，贡戈拉年轻时却曾桀骜不驯，且颇有几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太白式洒脱。

她曾经这样写道：

你有另一神圣根由，
另一辉煌未来可求。
只要愿意便能想象：
你的归宿应是天堂，
人生仅为一次旅行！
[……]^①

她固然对西班牙文坛泰斗洛佩敬重有加，却并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她甚至有意炫耀自己的女性身份，说自己足够富有、高贵、美丽和善良，而且满怀纯洁的爱。她这样回复洛佩：

关于自己我已言明，
或可满足你的好奇。^②

而阿玛丽利斯也是洛佩对情人玛尔塔的呢称，尽管当时他已正式成为神父。为了厘清圣爱与俗爱的关系，阿玛丽利斯曾明确表示，她不懂俗爱和肉欲，只知道一心向主。因此，她在给洛佩的信中亲切地称他的阿玛丽利斯为塞利娅（意为天堂女子，同时含有暧昧的同性恋指涉）。她不无戏谑地请洛佩切莫妒忌，由此可见两人关系非同寻常。那是一种类似于神交的默契。

洋溢着欢乐和安慰，
无须世俗遮羞织锦，
惟有天然对话心交。^③

西班牙语文学家梅嫩德斯·伊·佩拉约认为单就洛佩和阿玛丽利斯的信札而言，后者无论思想还是才气均明显略胜一筹^④。而胡安娜曾赋诗赞美阿玛丽利斯，称其为“天庭的阿玛丽利斯”^⑤。

也许正是出于类似的猜想，学者特耶兹-蓬以《燃烧的爱情》(2017)^⑥为题结集发表了胡安娜修女的五十首艳情诗，引起了我的关注。这些诗篇大都是女诗人献给副王总督帕雷德斯夫人^⑦的。它们像一把普通的珍珠散落在诗人的各色文集、全集当中，并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盖因即景赋诗、敷衍达官贵人，乃西班牙“黄金世纪”风气使然。除了献给副王总督夫人，胡安娜也曾献诗副王总督和其他尊长。但是，胡安娜是同性恋吗？她曾暗恋总督夫人吗？问题一俟提出，便再难回避。借用著名诗人帕斯在其专著《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或信仰的谋略》(1982)曾以非凡的艺术直觉所言，胡安娜遁入空门是一种谋略，而非单纯的信仰^⑧。

且看胡安娜那首脍炙人口的抒情诗《泪流慰痴情》，没有人会认为那不是失恋者的哭诉^⑨。与此同时，她在《初梦》中将男权世界描绘得阴暗如晦、俗不可耐，并且又如此这般地反诘男人：

① Ibid., p.101.

② Ibid., p.102.

③ Idem.

④ Ibid., p.104.

⑤ 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 “Obras completas”, México: Ed. Porrúa, 1985, p.119.

⑥ Téllez-Pon, Sergio, “Un amor ardiente: Poemas a la Virreina”, Madrid: Editorial Flores Raras, 2017.

⑦ 本名玛丽亚·路易莎·康萨加·曼里盖·德·拉腊(Gonzaga Manrique de Lara, María Luisa)。

⑧ Paz, Octavio, “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 o las trampas de la fe”, Barcelona: Seix Barral, 1982.

⑨ 《拉丁美洲历代名家诗选》，赵振江编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7 页。

男人们多么愚蠢
无端地责怪女人，
全然不反躬自省：
他们是一切起因。
[……]^①

然而，作为生长在17世纪的女性，逃避男人的唯一方式是遁入空门、当个修女，否则，她就必须结婚生子。由此看来，她甚至没有萨福的时运。也许正是出于某种灵犀，阿拉托雷教授早在2001年就曾指出，胡安娜和玛丽亚·路易莎(帕雷德斯公爵夫人)的关系不同寻常。这种不同寻常在于二人的高度默契和惺惺相惜^②。

在献给公爵夫人的数十诗章中，胡安娜不断称呼前者为神圣的丽希或非丽丝。丽希和非丽丝自然是路易莎的昵称，而神圣就不是一般的恭维了：

如此我，神圣的丽希，
多日来潜心理经事主；
唯有他，以及他的人，
才能享受你亲切抚摸。
[……]^③

或者：

[……]
在如此跳动的同心
欲望正战斗般抗争，
恰是世界末日混沌，
恰是身体萌发感情。

惟有这纯粹的心灵，
燃烧着信仰的火焰，
这是最纯洁的牺牲，
献给了真爱和沉默。

这就是对你的崇拜，
这就是芬芳的庙宇；
那请求意味着罪孽，
那渴望充满着害怕。

须为希望添加燃料，
为自己的一切辩解，
以便获得更多恩赐，
引来更多猜疑妒忌。
[……]

作为女人，正当年，
不能是爱你的障碍；
你明知道，俩灵魂
无关乎距离和性别。

① Sor Juana Inés, Op. cit., p.183.

② 阿拉托雷本人也是一个同性恋者，他虽然与德籍女学者玛尔吉特·弗兰克结过婚，但很快就离异了。Alatorre, “María Luisa y Sor Juana”, Periódico de Poesía, otoño 2, 2001, pp. 8-37.

③ Sor Juana Inés, Op. cit., p.25.

再说自然规律使然，
尊重其然才是美丽：
美美与共的大恩赐，
如此这般和谐与置。
[……]^①

在这首长近两百行的谣曲中，胡安娜充分表达了她内心的渴望与挣扎，不仅具有宗教般的虔诚，而且显示了非凡的勇气。尤其是在本节所引的后两节，她几乎完全袒露了自己的心结。当然，说到丽希，我们便不能不联想起西班牙“黄金世纪”诗人克维多的十四行诗。后者也曾讴歌女神的隐秘爱情^②，而且用目光代替嘴唇，从而使想象空间陡增。同样，在另一些献给公爵夫人的诗行中，胡安娜面对前者的肖像居然如此感慨：

哦，丽希，你的美丽
固然复制于坚硬画框，
但你的美丽岂止于此，
美丽早溢出画框坚硬！

丽希，当然应该入画，
让画家将你美丽复制。
倘使没有了这幅肖像，
别人怎识得这等美丽？

[……]

哦，丽希，你的美丽
固然复制于坚硬画框，
但你的美丽岂止于此，
她们早溢出画框坚硬！

此在，时光无情流逝
未使你失去灿烂容颜，
画作也依然保留一二
你这自然天成的美丽。^③

副王总督夫人固然不只是玛丽亚·路易莎一个，但胡安娜的感情似乎跨越了时空，她心目中的丽希只有一个。即使她在赞美其他总督夫人时，这一个丽希始终定格在玛丽亚·路易莎身上。然而，此前她曾百般诋毁名人肖像。

至此，我们可以断言，胡安娜遁入空门一定有她的原因。说笃信宗教，她却每每违反教规、潜心于文学和科学；说不够虔诚，她又分明心无旁骛，直至献出年轻的生命^④。孰是孰非，孰此孰彼，也许只有她自己知道。后人无论怎样推演，终究难以企及她早逝的英魂。我曾多次拜访她曾经所在的圣哲罗姆修道院，感慨系之，不能不唏嘘叹惋，寒窗犹在，香魂可曾安息？

三、“禁毁小说”或殖民地的奇葩

毫无疑问，小说在殖民地时期的“阙如”主要归咎于西、葡殖民当局的禁毁，这在英、法殖民地另当别论。但是，小说犹如野火春风，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始终不会完全缺席；一如“百日维新”和“五四”运动

① 黑体系引者所加。Ibid., pp.26-27.

② Sabat de Rivers, Georgina, Op. cit., p.124.

③ Sor Juana Inés, Op. cit., pp.106-107.

④ 为照料瘟疫感染者不幸离世，年仅44岁。

之前的中国,小说即或大量存在却怎么也入不得统治阶级和一般文史学家的法眼。及至时移世易,梁启超发表雄文《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林纾大量移译西方小说、王国维推出《〈红楼梦〉评论》,等等,小说这个“古来无史”并被称为“稗官野史”,甚至“倡优之术”的“玩意儿”^①开始登上大雅。

因此,西、葡殖民地小说是在独立运动之后才获得正名的,而殖民地时期的大量作品则一直要到近期才得见天日。整个殖民地时期被称为“没有小说家的小说”,尽管“其现实比小说更荒诞”^②。也正因为如此,在过去的西、葡语文学史料中,我们无缘得见殖民地小说的影子。而这个“乌有之乡”却原来还是个文学富矿,亟待发掘整理。换言之,自从被欧洲人发现的那一刻起,美洲便不再是小说家阙如的地方,而是一部真真正正的今犹未竟的大小说。为弥补中外文学史的有关空白,这里不妨对殖民地时期的小说略作扫描。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大量手抄本的相继发现,殖民地小说刚刚露出它的冰山一角,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探究尚需假以时日。

用批评家罗德里格斯的话说,殖民地小说很难用传统方式来予以界定^③。此话是在四十年前,当时刚有儿部作品“破土而出”。如今,它们“开枝散叶”,犹如一群无父无母的野孩子,四散遍野,不仅很难用欧陆传统界定之,而且每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拘牵于规则,也无所谓发表(因为它们大抵不准备发表,也根本无法发表)。笔者通过耙梳有关文献,对目前确认的16、17和18世纪殖民地小说进行了粗疏的整理,大约有数十种之多。

先说16、17世纪,这些还不包括那些夹杂在浩繁史书或编年中独立成章的篇什、小品、插曲。但是,它们见证了西班牙、葡萄牙的盛极而衰,同时也是其美洲殖民地从建立到稳固第一个百年的写照。与第二个百年不同的是,第一个百年间殖民地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尽管它建立在印第安人的血泪和尸体之上。在此期间,土生白人逐渐成为殖民地社会的重要橄榄肚,他们一方面受到来自西、葡宫廷及其所遣大员的掣肘,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压迫和剥削印第安人。同时,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衰落,殖民地土生白人又有了同英、法、荷等其他欧洲强国及其商人眉来眼去的机会。这些不仅是殖民地前期小说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土壤,而且同样也是这些小说何以如此缄默、如此杂乱、如此不按规矩出牌的重要原因。至于作者的疑似,则主要是因为目前所展示的作品均来自手抄本,而非正式出版物。

此外,土生白人需要自己的话语体系,并致力于寻找表达情感、展示生活的介质。而小说无疑是最佳的选择。盖因诗歌这个阳春白雪被上流社会玩弄于股掌之间,甚至是副王总督府宣达风雅的重要手段。戏剧更不待言,它受剧场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况且16、17世纪,小说即或在欧洲也还是个新生事物,不仅尚未定型,而且很不受上流社会的待见。除了前面说到的禁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骑士小说曾在西班牙、葡萄牙风靡一时,但“特兰托教务会议”对其进行了强有力的清算,从而遏制了所有“宣讲、涉及、叙述或教授异端邪说的书籍”在美洲殖民地的流布^④。用我们先人的话说是为了阻止“海淫诲盗”。

然而,新大陆从一开始便是小说的沃土。骑士道固然没能在这里流布,但骑士小说的某些元素却伴随冒险家的足迹和殖民者的暴行率先为美洲小说提供了新的向度。用文学史家恩里盖斯·乌雷尼亚的话说,一开始,美洲就是真实与魔幻的混合物^⑤。关于这一点,哥伦布信札和早期西班牙殖民者的著述皆有涉及,此处不赘。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说,魔幻是美洲的特征^⑥。

从目前已知的文献资料和新发现的手稿、抄本判断,美洲殖民地“魔幻”小说早在16世纪便已四处开

① 胡适在评论陈独秀时说过,后者对五四“文学革命”作出了三大贡献,第一条便是“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了三大主义”。胡适:《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92页。

② Sánchez, Luis Alberto, “Los libros del conquistador”, 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53, p.37; “Proceso y contenido en la novela hispanoamericana”, Madrid: Editorial Gredos, 1953, p. 87.

③ Chang-Rodríguez ed., “Prosa hispanoamericana virreinal”, Barcelona: Editorial Hispam, 1978, pp.1-7.

④ “特兰托教务会议”因在意大利北部特兰托召开而得名,是16世纪上半叶天主教第十九次教务会议。会议时断时续,历时十八年之久,目的是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维护天主教地位。耶稣会士在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陆续通过的重要决议有:宣布所有新教徒为异端;天主教会的教条和仪规全部正确,必须严格遵守;重申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威;创办神学院,加强教士培养;开列“禁书目录”,其中包括大量骑士小说。Castro, Américo, “El pensamiento de Cervantes”, Barcelona: Editorial Noguer, 1980, pp.23-28.

⑤ Henríquez Ureña, “Las corrientes literarias en la América Hispánica”, 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49; “Reimpreso en Historia y crítica de la literatura latinoamericana”, Barcelona: Editorial Crítica, 1988, p.111.

⑥ García Márquez, “La soledad de América Latina”, discurso de aceptación del Premio Nobel, 8 de diciembre de 1982.

花，至于地下流传的篇什则尽可上溯至殖民地诞生之初。当然，第一部产生影响的小说应该是1690年的《阿隆索·拉米雷斯的厄运》，尽管一般文学史家往往将此殊荣授予近年发现和出版的玄幻小说《神奇沙漠》。后者的作者应为哥伦比亚作家索利斯，其作品的创作时间被推定为1650年。而事实上，最近不断有比《神奇沙漠》更早的作品现世，只不过它们长期被淹埋在殖民地当局刻意制造的“小说沙漠”之中。譬如《修女传奇》，原名《修女阿尔菲雷斯的故事》可能是女作家卡塔利娜·德·埃劳索完稿于1630年左右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讲述了修女阿尔菲雷斯的传奇故事。作品虽然早在1625年就曾小部分出版于马德里，却迅速陷入沉寂，及至1820年才被重新发现，并以注疏本的形式在巴黎出版，而其在西班牙语美洲引发关注也是最近的事。《修女传奇》堪称奇书，它的主要贡献在于揭露旧大陆和新大陆的男男女女如何成为一丘之貉，男人好色，女人贪财。其中的伪善和欺骗可谓比比皆是。由于是“自传体小说”，它便格外逼真。但同时作品内容奇崛、形式独特，充满了奇思异想。修女这个主人公当然是虚构的，但恰恰因其女性身份而夺人眼球和富有张力。小说凡二十六章，用第一人称并以忏悔的方式讲述“自己”的冒险故事，其中不少片段让人分不清人物性别。用学者埃雷迪亚的话说，作者本身就是一位颇具男子气的女性形象，由于行为不轨被逐出修道院后，她到处流浪，喜欢仗剑走天下。用人物的话说，她“像羽毛一样随风飘荡”。其中，她有关修道院的夸张评点多少让人想起薄伽丘的《十日谈》和拉伯雷的《巨人传》。

又譬如《绵羊》，作品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坊间流传，从而导致其版本之多远超我国的《红楼梦》。至于它被当作小说，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史书则是近来之事。正如学者罗德里格斯所说的那样，它完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小说，用作者的话说，她是哥伦比亚文坛美丽的孤女^①。

显而易见，作者话里有话。一如我国的一些古代话本，它是在两个多世纪的传抄过程中逐渐定型，并最终“出阁”的。此外，那些美丽的衣裳和首饰、婚宴和花朵则是从新格拉纳达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攫取的。如果继续引申，那么这些比喻也完全可以被认为是时人对殖民地书检制度的讥嘲：现实是不能赤裸裸现身纸上、诉诸笔端的，它必须乔装打扮，甚至装点得珠光宝气、光彩照人。从实际内容看，小说由四部分组成：一为历史，二为历史的变奏，三为相对独立的故事，四为自传。这四部分内容相互交杂，又各有其妙。正因为如此，有批评家称罗德里格斯·弗雷伊莱是美洲第一位短篇小说家^②。作品总共奉献了二十四则几可独立成篇的“小故事”，作者有时是它们的客观转述者，有时是亲历者，有时则更像是它们的注疏者或点评者。近年，有学者试图用普罗普的“故事学”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这当然有待商榷，盖因罗德里格斯·弗雷伊莱在收集和叙述这些故事时相当任意，并未表现出建立故事谱系的取向；况且历史语境也不允许他有如此先见之明，能够领先普罗普几百年萌生这般学术精神。它们完全不同于人们在其他大陆的所见所闻，自然也不按其他大陆小说的陈规出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绵羊》表面上看来是一部关于新格拉纳达的“信史”，却在人们不经意之处夹杂了作者或作者们的私货，对殖民地世相丑态的揭露。每当此时，作者或作者们会提醒读者，“请读者稍安勿躁。”从我国正史与野史（演义）关系看，《绵羊》既是正史，也是演义。

类似的作品还有《幸福的囚徒》，它写西班牙士兵被印第安人俘虏后如何重新发现新世界的神奇经历，其中的印第安人不但仁慈，而且聪慧。士兵皮内达很快融入了印第安部落，还学会了他们的语言、甚至开心地朗诵他们的诗句，譬如感伤的“Ab cuduam in ema”（“我心伤悲”）和欢乐的“Hu (y) elpurún”^③（“舞之蹈之”），如此等等。

同样，在卡兰恰和托雷斯的《奥古斯丁会隐修士的秘鲁省纪实》中，正史中夹杂了一篇脍炙人口的野史《血缘逆袭》。这是一篇相当诡异的小说，叙述一位叫作迭戈的修士，他因故扭曲了人性，成为无恶不作的魔鬼。于是，他被修道院扫地出门，到利马附近的一个乡村教堂去投靠他的神父兄弟，还遇见了出落得亭亭玉立的胞妹，结果毫无人性地占有了她。年少的妹妹经不住他的花言巧语和兄弟俩的阴谋诡计，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然而，随着她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他们不仅没有逃之夭夭，而且栽赃给了利马的一位绅

① Rodríguez Freile, Juan, “Conquista y descubrimiento del Nuevo Reino de Granada”, Medellín: Editorial Bedout, 1968, p. 82.

② Ramos, Oscar Gerardo, “El Carnero. Libro de tendencia cuentística”, Boletín Cultural y Bibliográfico, Bogotá, vol. IX, n2, 11, 1966, p.2179.

③ 阿劳科语的拉丁表音。

士。为了替妹妹“讨回公道”，他们居然选了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在一起事先张扬的决斗中杀死了那位绅士。后来，他们又联手杀死妹妹，以绝后患。绅士家属的诉讼和妹妹的横死使他们不得不逃离秘鲁，前往巴拿马。最后，一个暴卒，另一个染上了瘟疫。弥留之际，后者良心发现，留下了自己的忏悔：这个故事。它实在是耸人听闻，也许正因为如此，即使在当今美洲文坛仍引发了不小的震荡，有人认为它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但也有人觉得恰好相反，认为它有哗众取宠之嫌^①。孰是孰非，难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确为西班牙语美洲小说开启了一个罕见的维度，其辛辣和咸湿程度远超《十日谈》。

再说《神奇沙漠》，其抄本自20世纪60年代被发现后，先后于1977年、1984年和1985年分三卷出版。它的二十二章，又称“二十二栋”，几乎集合了所有体裁，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因此，这是一部相当繁冗的作品，它的“重出江湖”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一些学者对其进行过文学、史学和宗教学等不同维度的探讨，尽管方兴未艾的“文学爆炸”遮蔽了这些声音。其中，学者克里斯蒂纳将《神奇沙漠》同《堂吉珂德》相提并论，认为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一叙述者一人物的转换达到了令人瞩目的地步^②。

再就是西哀萨·伊·贡戈拉的《阿尔丰索·拉米雷斯的厄运》，关于这部小说，需要说明的是它既像流浪汉小说，又分明是反流浪汉小说。这是目前拉美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小说的基本内容是流浪汉阿尔丰索·拉米雷斯的故事，由此，一般批评家认为它是一部典型的流浪汉小说^③。然而，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后者的核心观点在于作者违背了流浪汉小说的基本规则——第一人称叙事。也就是说，关键时刻索利斯改变了路径，用他自己的“我”取代了人物的“我”。问题是，流浪汉小说本身也是新生事物，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则，索利斯从人物的“我”转化为自己的“我”无非使作品从自传变成了传记。即使从“口传”到书写，在17世纪也只不过是小小一步，而非散为万珠、聚则一贯，“从口传神话到荷马史诗”^④。

归根结底，小说对于殖民地文坛始终是个“原罪”般的禁忌，这确实导致了它的厄运，而这种厄运或命运多舛又终使其不断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与16、17世纪一样，18世纪并没有使西、葡殖民地小说摆脱“原罪”，人们依然对它讳莫如深。但是，另一方面，启蒙思想开始传入美洲。这在20世纪拉美小说中多有彰显，如古巴作家卡彭铁尔关于18世纪的一些作品《人间王国》和《光明世纪》，以及阿雷纳斯、罗德里格斯·胡利亚等人的作品也对启蒙世纪的西、葡殖民地有过描写。

也许正是受了启蒙思想和欧洲新古典主义的影响，小说产量在18世纪明显减少。启蒙思想固然导致了海地革命，但端庄、雅致的新古典主义显然不是殖民地小说的向度。如是，少量业已发现的作品也明显缺乏之前的自由洒脱。其中，《流浪盲人的小癞子》(1773)，顾名思义，是一部典型的流浪汉小说，而且明显借鉴了《小癞子》等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小说讲述美洲小癞子作为旅行者——西班牙御用稽查员的领路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利马的经历。作品固然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社会学般的数据作支撑，但从叙事艺术的角度看却较之前述16、17世纪小说逊色不少。相反，几乎同时创作的《梦之梦》(1788)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玄想。作品别出心裁，假借克维多之名以“丑化”美洲殖民地，几可谓是一部令人称奇、充满幻想色彩的“穿越”小说。

此外，同时期卡尔萨达的自传体小说《希尔·布拉斯·德·桑蒂亚纳的族谱》(1792)几乎不折不扣地延续了法国作家勒萨日《吉尔·布拉斯》的故事。而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神父波拉尼奥的《死亡的奇幻生涯》(1792)^⑤则部分借鉴了17世纪小说《走火入魔》的路径，即将美洲殖民地隐喻为地狱，其中的人物不是鬼魂，就是亡灵。作品一定程度上幽幽地成了墨西哥魔幻现实主义的先声，无论是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还是《寻梦环游记》，大抵都是围绕亡灵展开的。当然，借亡灵以宣达人事，这也是蒲松龄的做法。《死亡的奇

① Chang-Rodríguez, “Violencia y subversión en la prosa colonial hispanoamericana”, siglos XVII y XVIII, Madrid: Porrúa Turanzas, 1982, pp.90-93.

② Cristina, María Teresa, “La literatura de la Conquista y Colonia”, Manual de Historia de Colombia, 3* ed., Bogotá: Procultura, 1984, p. 555.

③ Johnson, J.G., “Picaresque element in Carlos Sigüenza y Góngora’s Los infortunios de Alonso Ramírez”, Hispania 64, 1981, pp. 60-67.

④ Lagmanovich, David, “Para una caracterización de Infortunios de Alonso Ramírez”, Historia y crítica de la 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 Época Colonial, ed., Cedomil Goic, Barcelona: Editorial Crítica, original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ed Jan 19, 2010.

⑤ 原标题十分冗长，为《皇帝恶行和人类本性的报复者、墓地的皇后与死亡的奇幻生涯》(La portentosa vida de la Muerte, emperatriz de los sepulcros, vengadora de los agravios del Altísimo, y muy señora de la humana naturaleza)。

幻生涯》凡四十章，外加一个前奏、一个尾声和一份遗嘱^①。第一章为“祖国和死亡的父母”，写亡灵来到世上。他们在经历了“人生遭际”之后，因所犯罪孽受到最后的审判，直至衰老和死亡（或再次死亡）。作者假借人物（亡灵）之口，奉劝读者弃恶从善，即放弃贪生的欲念，追求向死的善终。

还有奥拉维德创作于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之交（1797—1803）的系列小说。它们大抵具有教化目的，而对游手好闲、野心勃勃、嫉妒猜忌、心术不正等进行针砭，同时彰显质朴或崇高背后的一应品质或传统美德，如谨慎、诚实、忠心、勤劳等等。

总之，从目前业已露出的冰山一角，当可看出美洲西、葡殖民地小说的庞杂。这就是说，小说这一体裁不仅没有在殖民当局的高压下销声匿迹，恰恰相反，它们野火春风般地滋生、蔓延。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政治高压和有关禁令，殖民地小说始终“孤魂野鬼”般流散于坊间，甚至潜入地下，成为美洲殖民地时期一股时隐时现的“逆流”。

[责任编辑：孙绍先]

A New Enlightenment of Sacred Texts: The Three Literary Wonders in the Period of Colonial America

CHEN Zhong-yi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It is known to all that the ancient American civilization is plundered and ravaged by the earlier colonists from Spain and Portugal, as well as the later ones from Britain and France. This can be confirmed not only by the plenty of faithful historical accounts left by the colonists and the narration of those generations of mixed European and Native American ancestry, but the accusations of some missionaries and many indigenous Americans as well. As for the literature, the major focuse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on the orthodox and prevalent comments in the colonies. However, the marginal,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re regarded as “heresies”, which are reticent or dumped or banned. In this paper, some tentative opinions are stated about the three literary wonders in the period of colonial America, which involve *Popol Vuh* as the ancient legacy, “The Tenth Muse” as the “orthodoxy”, and the “banned novels” as the heterodoxy.

Key words: period of colonial America; *Popol Vuh*; the Tenth Muse; banned novel

^① Bolaños, Joaquín Hermenegildo, “La portentosa vida de la Muerte,” México D.F.: El Colegio de México, 1992.

本期特稿作者 简介



陈众议，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西班牙皇家学院外籍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班牙语文学和文艺学。

1977年入复旦大学，1978年被选派留学，先后就读于墨西哥学院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哲系研究生部。1982年应召回国，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1987年获墨西哥国家奖学金并被墨西哥学院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同时录取为博士研究生。1999年应邀在西班牙康普鲁坦塞大学和马德里自治大学访学。

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助理、副所长、所长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外国文学史》、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经典作家系列》。2003年获国家留学归国人员成就奖。

主要专著：发表《20世纪外国文学史》《魔幻现实主义大师》《拉美当代小说流派》《20世纪墨西哥文学史》《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博尔赫斯》《西班牙文学简史》（合）《西班牙文学大花园》《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堂吉诃德的长矛》《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游心集》《亲爱的母语》等专著和文集十余部。

主要论文：在《人民日报》《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外国文学报道》《外国文学评论》《世界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当代外国文学》《中国图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中国翻译》等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作家文摘》等全文或观点摘编。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发表长篇小说《玻璃之死》《风醉月迷》等。